

少数民族史志丛书

仫佬族簡史簡志合編

(初 稿)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少数民族史志丛书
仡佬族簡史簡志合編
(初稿)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一九六三年七月

前 言

为了反映建国十年来党在民族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反映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新的面貌以及新的民族关系，阐述党的民族政策，同时向全国人民进行一次广泛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曾在1958年组织所内外大批人员，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一面继续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这一工作从1956年即已开始），一面开始编写《少数民族史志丛书》（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或简史简志合编），到1959年底，大部分书稿都已写出初稿。

这几年来，虽经迭次修改，质量有所提高，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甚至错误。现在不加改动的把这些初稿印刷出来，一方面是为了保存资料，免于散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了便于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今后能够组织适当力量加以修改、充实和提高，逐个的达到公开出版的要求。因此，我们希望各地的有关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科学工作者，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群众，能够多给我们以批评和指正。

1963年7月

目 录

概 况	1
壹、民族名称和源流	4
貳、古代、近代社会历史	11
叁、解放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19
一、解放前经济状况	19
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25
三、语言、文化、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	30
肆、仫佬族人民的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	37
一、人民政权的建立	37
二、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	40
伍、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45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	45
二、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9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就	50
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57
柒、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	61
一、总路线的宣传贯彻和人民公社的建立巩固	61
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	64
捌、民族干部的成长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	70
一、民族干部的成长	70
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	71

概 况

我国南方的广西僮族自治区境内，居住着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仫佬族。

仫佬族有50,125人（据1958年统计），其中居住在罗城县的有45,168人，占本族总人口90%以上，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县城附近的东门、四把、大福、石门、桥头、下里、集环等区或人民公社境内；另外，居住在宜山县有1,878人，柳城县有1,262人，都安瑶族自治县有1,051人，忻城县有548人；还有少数散居在河池、环江、东兰等县内。这些地区除仫佬族外，还有汉、僮、苗、瑶等兄弟民族。长期以来，他们就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进行经济上的、文化上的交流，共同缔造了祖国光辉的历史和文化。

仫佬族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其语言属汉藏语系、僮侬语族、侬水语支，与毛难族、侬族语言非常接近，也有部分词汇和僮语相同。由于长期以来仫佬族就与汉、僮等兄弟民族杂居，他们互相间的交往极为频繁，关系也极为密切，因此，绝大部分仫佬族人民会说汉语，部分会说僮话，汉文和汉语已成为仫佬族地区各族人民互相联系的交际工具。

仫佬族住区属云贵高原苗岭山脉南沿地带，是一个山区地方。山岭绵延起伏，峭壁奇峰，随处可见。地势一般在海拔500至1,000公尺之间，其中拔地而起的有凤凰山、砬山、伏安山、冰

玉山、青陵山、磨盤山、东山、甘場山、文峯山、北陵山等大石山，間有坳岭丘陵交錯，构成了許多縱橫寬廣三、五里的狹谷平坝，为人們居住和耕作的处所。境內河流不多，在罗城县只有两条較大的河流：一是武阳江，发源于县西北六十里的四堡，流經黄金、寺門、小长安，至牛鼻河口与融江会合，長約150公里；一是龙江，发源于貴州省荔波县境，流經宝坛、天河、祥貝、古龙等地出宜山县，在县境內流長約100公里；此外，还有西江、圣水、乐登水等小溪流，可供农田灌溉。

这个住区位于东經108—109度、北緯24—25度之間，属北溫带，气候溫和，全年平均溫度在摄氏20度左右，其中以六、七、八月气温最高，月經最高溫度在37度左右，十一、十二、一月气温低至0.5度左右；境內雨量充沛，全年降雨量达1,300公厘，以春、夏两季雨量較多，秋冬較少，据記載，春季雨量380公厘，夏季420公厘，秋季264公厘，冬季180公厘。

地質属古生代下二叠紀至中二叠紀，主要是灰鈣土和紅黏土，属喀斯特地形，石山占很大的面积。山岭上石灰岩层广布，間杂有紅黏土，平原多黑色冲积土，土質肥沃，宜于农业生产。

在这种优厚的自然条件下，物产資源相当丰富。农作物中，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和薯类为主，其次是豆类 和 麦类；經濟作物有花生、芝麻、油菜、苧麻、甘蔗、棉花等。土特产有竹、木、茶叶、藍靛、药材、蒜芯等。矿产有煤、硫、鉄、鉛、鋅、錳、鎳、云母、石棉等十多种，其中特别是煤硫矿，分布在仡佬族住区的勾山、九龙、白馬、塘底山以至于太平、銀村、桥头、四把、小长安、龙岸一带，面积87方公里，煤层厚至一公尺左右，大都是无烟煤，藏量丰富，質量也好。解放前，由于官僚、

地主階級的霸占壟斷，沉睡萬年的寶藏，沒有得到充分開發利用。解放後，黨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仫佬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先後在九龍、塘底等地建立了煤硫礦廠進行開採，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寶貴資源。

仫佬族是一個歷史悠久、勤勞勇敢的民族，早在替代以後，她就被包括在“伶”（原作矜）、“僚”（原作獠）等泛稱中出現於我國歷史上，接着又相繼以“穆佬”、“木（原作牀）佬”，“木婆”、“姆（原獬）佬”等名稱出現。長期以來，他們就與漢、僮、苗、瑤、侗、毛難等兄弟民族雜居在一起，共同勞動，共同鬥爭，共同締造祖國的歷史和文化。鴉片戰爭以後，我國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仫佬族地區和全國各地一樣，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至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統治期間，各族人民更處於水深火熱的悲慘境地。但是，勤勞勇敢的仫佬族人民從來沒有屈服過，他們和各族人民在一起，向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推動社會歷史向前發展。

1949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解放後，仫佬族人民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在黨的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以及漢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相繼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以及經濟戰綫、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勝利，建立了鞏固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1958年，在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高潮，並勝利地實現了農村人民公社化，各項建設事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現在，仫佬族人民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正在高舉起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繼續奮勇前進。

壹、民族名称和源流

仫佬族的名称和源流，在本民族传说，族谱以及某些史籍记载中，说法都不一致。

关于仫佬族的名称，在民间普遍流传说：“先祖来时，说的是汉语官话，因和本地说仫佬话的女人（也有的说是苗族或侗族）结婚，生下子女所说的话和风俗习惯都跟从母亲。我们的语言是倒装的，称母亲为‘姆佬’，‘姆佬’族称就是这样来的”。族谱的叙述与上面的传说基本相同。

史籍上仫佬族的古称，常常包括在“僚”（原作獠，下统改为僚）和“伶”（原作矜、下统作伶）的泛称内，有时直接称作“伶”或“僚”，有时两者并称。清代以后的史籍中，广西境内开始有仫佬族名称的出现：

清嘉庆年间修《广西通志》说：“天河僚在县东，又名姆佬。”又说：“罗城县东一、西一、西七、西九、东五、平东、上里，皆伶所居。”

《大清一统志》说：“姆佬即僚人，……宜山天河有之。”

《古今图书集成》说：“天河县邑分四乡，县东八里咸伶种，名曰姆佬。”

《新天河县志》说：“伶人又名僚，俗名姆佬。”

这些记载，与现在仫佬族住区基本相符，“仫佬”是文献中“姆佬”的同音异写。

在贵州省古文献中有“木佬”、“木佬苗”等称谓的记载：《大清一统志·贵阳条》说：“木老在贵定县，性狡悍，善制刀……都匀黔西一带有之。”

檀萃作《说蛮》说：“木老性狡悍，善制刀……。”

羅繞典《黔南職方紀略》說：“晉代邛笮間有僚……其種蔓延今之黔粵，諸蠻种多役屬之，遂名其役屬之蠻为仆僚，其僚人則謂之主僚。其僚訛为倮僚，仆僚訛为木佬。”

李宗昉《黔記》說：“木佬苗有王、黎、金、文等姓。”

有人根据这些記載認為：“木佬”、“木佬苗”等称谓与今天仡佬族称没有什么区别。这个說法也是有可能的。

总之，不管是“姆佬”抑或是“木佬”、“木佬苗”的称法也好，她都和“伶”、“僚”連系起来，而“佬”与“僚”音极相近，現在仡佬族仍自称为“Lam ɿ”，与“伶”音相近，因此，仡佬族名称和古代的“僚”、“伶”称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当然，“僚”、“伶”不能与今天的仡佬族等同。因为“僚”早在晋代（公元265—420年）就已出現，她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统称；“伶”的分布范围也很广，包括今罗城、宜山、融安、环江、平乐、荔浦等十余县。不过，我們可以設想，在泛称的“僚”和“伶”部族中的一支，发展成为今天的仡佬族是有可能的。

至于仡佬族究竟是外来民族抑或是土著民族呢？古今說法还有分歧。

根据罗城县罗、銀、吳、潘、謝等姓仡佬族的宗譜、碑文和傳說，都一致說他們的祖先是元朝或明朝期間，分別从湖南、河南、江西、福建、山东、北京等地迁来的：

章罗罗氏宗祠建祠碑說：“吾族为楚中望族，而罗王祖于元朝年間来游西粵，见此地山水清奇，民风朴茂，遂于鳳凰山下家焉。其后子孙繁衍，漸成村落。迨乎有明洪武二年，由西門对河迁县治，如此竟将吾聚族而居之罗义村移往西門外二、三里地方居住，即今之大、小罗村及孔章村是也。……查吾姓由湘来桂，

散居柳庆一带者，如县属之黄金、寺門、安乐、宝坛、三防各村乡，其他宜山、柳城、馬平、天河各县，莫不有吾姓聚族而居。”

罗姓分支的“三冬”于1911年鼎建祠碑中，除引宗祠所述外，还有一段說：“吾祖公系湖南长沙省武岡州桥头村，幼年入籍江西，嗣后随祖父至罗邑，居住罗义村，遂立业焉”。

居住在天河小稔村罗姓仝佬族祖坟碑記也說：“始祖本豫章江西省吉安府吉水县大塘村，先代迁来粵西天河县稔村頂騰高戶籍。”

这些記載和民間傳說一样，都說他們的祖先来自江西（也有来自湖南說的），先居住在罗义村，宋代，罗城县治設置于罗义村，他們迁住罗瑤村，但仍沿用罗义村名，故今尚有“先有罗义，后有罗城”的俗語。

分布于中石、右洞、凤梧、黄金等地的銀姓，他們的墓碑、宗譜和傳說都認為先祖来自河南开封府：

光緒十二年（1886）三月十九日立的“明故始祖銀諱文勳文質二公并始祖妣之墓”碑載：“嘗考世系始祖二公係鼻祖諱穆軻公之冑，籍居河南开封府无錫（按无錫屬江苏地）人氏也。洪武年間迁至罗城新林里遂居焉。”

咸丰三年（1853）鼎立的銀姓宗祠碑文說：“考我世系出自中州。洪武年間始迁融水，所住者則于寨岩下脚，所来者即勳、質二公。降及六、七世时，始分冷山立宅。逮后枝繁虽分，其本源系勳祖苗裔，而勳祖以前，已渺莫考，勳祖以后，若可追踪。嘗聞父老流传并见旧册所載，皆曰原籍則自河南开封府无錫人氏。”

在大梧村、新村等地吳姓的总祠、祖先灵牌及傳說，都認為其祖先来自湖南：

二冬总祠載：“先祖原住于湖南长沙省（按省字系誤），至洪武二年（1369）迁居罗城大梧安居乐业，迄今遺下係有十余代，人口过万。”

三冬总祠載：“原籍湖南长沙府玉明县，在明清两朝迁居粵西柳州府罗邑西乡七里安居，名曰大梧村，造屋創業，开戶三冬。”

六冬“明清两朝吳氏历代昭穆总祖先之灵牌”及族譜，均說其始祖吳德宗“原籍古居楚南长沙府茶陵县，地名五开卫……，于明成化六年（1470）癸酉岁春迁居至粵西柳州府罗城县西乡大梧村安居。”

住居于章罗大潘村、小潘村的潘姓，則傳說其祖先是由湖南长沙、武岡州来的。

謝姓的祖先来源比較复杂：

聚居在新村的，說他們的祖先来自福建省，“謝氏祖祠碑記”載：“窃聞祖父传云：远祖顏政于明朝自閩中播越此都，始基立郊田之陽，名曰謝村。迨国朝定鼎之后，始祖显亮迁移庄山之下一，启尔宇来胥宇，号曰新村。”

居住在石門乡中寨村的謝姓，一部分說其祖先来自南京，如清同治二年（1863年）刊立的宗祠碑記載：“祖籍原係南京金陵人氏，自晉徙江右，开天公迁隱罗阳（疑即罗城），卜居九里高礼村。”另一部分則說其祖先来自山东省青州府益都县（见四冬謝姓宗支簿序文）。还有石門乡謝村的謝姓，則說他們的祖先来自北京。

所有上述各姓氏来源的各种各样說法，虽說来处各有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即他們的祖先由外地迁来罗城以后，与

当地的妇女为婚，发展而为今天的仡佬族。

另外有些人认为仡佬族是贵州土著民族，而分散于湘西一带，主要根据如下：

《黔記》：“木佬，貴州所在多有，有金、王、黎、文等姓，在貴定、黔西者，娶婦異寢。”

《貴州通志》：“渝州蠻楊光震之子文广，才而賢，時高州（今貴州桐梓以東一帶）穆佬叛，文广命謝都統討平之。”

《宋史·西南溪峒諸蠻下》：“宋乾道七年（1171），知辰州章士邵上言……沅溪諸蠻，以靖康多故，縣無守御，仡伶乘隙焚劫。”又說：“沅州生界仡伶付崗官吳自由子三人貨丹珠，麻阳县巡檢唐人傑誣為盜，執之送獄，自由率崗官楊有祿等謀為亂。”

《新元史·宋隆濟傳》：“元大德五年，葛蠻土官宋隆濟暴動，揚言苗人仡佬，官將覓其發印其面運軍，三四年不返，又搆‘木姜苗’附之。……順元同知阿重深入烏撒、烏蒙、水東、招諭‘木姜苗’，縛宋隆濟以獻”。

《廣西通志》：“馬希武被殺，官軍集長安會剿，時諸徭皆來自貴竿及黃土坪，伶僮與三甲殘民，鉄弓勁弩，皆長其技。”

這些記載，認為仡佬族的原始居地為貴州，部分蔓延到湘西的靖縣、武崗、沅陵一帶，至元明兩代，由於中原封建王朝對那里少數民族人民的反抗鬥爭不斷進行血腥鎮壓，大批的仡佬族向南奔逃，因而廣西地區的少數民族名稱，由宋元以前仅有的僮瑤族的名称突然增加了仡佬、姆佬、伶、水等族稱。也正因為他們離開了原來的居地，所以到處無地可耕，無屋可住，過着流浪生活。

《赤雅》說：“伶人飢食橡薯，射狐掘鼠，蜂蠆蛭蟻，甘生如薺。”

《蠻司合志》說：“伶生兩江奧谷中，狀若猩獠。”

《廣西通志》（金志）說：“馬平伶俗簡陋，種山捕兽，時至圩市交易，永福、思恩伶山田磽瘠，時時苦飢，采葯負薪，易粟而食，謂之苦養伶。”

這些都反映了當時他們過着流亡生活的實際情況。

但是，為什麼現在僅廣西境內羅城等縣有仫佬族，而別的地方則沒有了呢？很可能是由於歷史上反動統治者採用民族壓迫政策，部分已向羅城遷移，而部分則與漢族或其他兄弟民族同化，而遷居廣西羅城境內的仫佬族，多聚居在城廂附近，形成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所以直到現在仍能保留語言、習俗上的一定特點。

上述這兩種說法是值得研究的。我們初步認為，仫佬族可能是土著民族，很早就居住在廣西境內。主要理由是：一，仫佬族之古稱常常被與泛稱西南少數民族的“僚”、“伶”、連系起來，而“僚”、“伶”很早以前就居住在廣西地區。二，本民族中有“先有羅義，后有羅城”的諺語，即章羅一帶的羅姓仫佬族，在羅城縣治未設置以前就已在那里建立了羅義村，縣治設立後他們才搬到今羅義村居住，這和僚族早就在那里居住相符。三，本民族族譜、碑記、傳說都認為他們祖先於元明間分別從江西、河南、湖南、山東、福建、南京、北京等地遷來，與本地講仫佬話的婦女結婚，生下子女，一切語言風習從母不從父，這說明了本地原來已有仫佬族居住，然後才有與本地講仫佬話的婦女結婚的說法。四，仫佬族是土著民族與主張來自貴州的說法沒

有矛盾，除了上面提及的“僚”、“伶”很早就住居在广西境内之外，罗城仫佬族住区与贵州很接近，而贵州南部的荔波等地在以前属于广西。

仫佬族的族称和源流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今后仍须继续深入考查研究。

貳、古代、近代社会历史

仫佬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远在管代以后，仫佬族的祖先就以“僚”的泛称出现在广西和贵州等地区内，与僮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人民一起，辟草莱，开阡陌，置田园，共同劳动，共同生活，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关于仫佬族封建社会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史籍缺乏记载，无法加以叙述，有待今后研究。

唐宋以后，中原封建势力已深入仫佬族地区。宋开宝初年，罗城正式建置县治，以后经过多次改易。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复分融水县辖的东隅里、西一里、西七里、西九里、东五里、东九里、平东里、平西里、高元里、布政里、安祥里、乐善里等十三地区的六百八十八村设置罗城县。洪武三十四年（1402）设立安祥、乐善二里，莫离、武阳、通道三镇，寨那、寨印、寨城、寨岭四堡。清代初年又把三镇四堡编户为十七里。这样，封建势力对仫佬族地区的统治压迫和剥削一步步的加强了，仫佬族和各族人民的痛苦更加深了。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封建王朝每年向罗城县内各族人民榨取官民田塘税1,910顷，征收夏秋两季税米6,821石，还有折色解司银527两。这些数字，在当时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对各族人民不能不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

以后，汉族劳动人民不断地从湖南等地迁入本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科学知识，从而促进了仫佬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生产已普遍使用铁器和

耕畜。据《罗城县志》記載：“馬、邑中民間多用以代耕。”民間流行的“十二时辰歌”也說：“人講养馬真是好，又得騎來又得犁。”這都反映了当时农业耕作的真實情况。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說蛮》中有“木老……善制刀”的記載，可能已有專門經營打鉄的手工业者。

适应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也随之发展起来。早在明代，封建剝削已极为沉重，造成了人民离散，田地荒蕪的景象。《广西通志》載：順治十八年(1661)，罗城知县于成龙有“革重耗，減盐引，招集流移，劝垦荒田”的記載。到了康熙、雍正、乾隆年間，封建統治者进一步在那里編戶置籍，把罗城划成四十四堡，实行堡兵制度，后又設千总和把总，进行更殘暴的压迫和剝削。据康熙二十二年郝浴著《广西通志》說：“伶者，僮之別种，……編于版籍，賦役亦如熟僮。”又說：“宜山伶，性习、居处、服食及婚喪，略与僮同，供賦役亦如熟僮。”每年仅罗城一地，賦額征地丁銀达二千八百九十八两（遇閏加征銀一百六十一两），米一千四百九十三石，仓谷一万二千石（见《广西通志·柳州府》）。这些数字儘管是封建統治者有意縮小了的数字，但仍可以看到人民負担之沉重情况。在这时候，高利貸剝削已頗为苛重，土地已相当集中，僱工和租佃剝削普遍地存在，地租率一般要占收获总额30%左右。

随着农业經濟的发展，交换也日趋繁荣。大約于清朝中叶，仫佬族聚居的罗城四把区已形成了初級市場，附近的各族人民經常来到这里交换农副产品和日用品。其他各地的仫佬族与市場也发生了联系。清雍正年間金鉉修《广西通志》說：“馬平伶俗陋簡，种山捕兽，时至圩市交易。”又說：“思恩伶人田磽确，时

时苦餓，采葑負薪易粟而食，謂之苦糞伶。”这两段話，正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反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来的是封建文化已有一定发展。明洪武三年（1370）罗城县开始創建学宮，到了清代初期，义学、社学亦相繼出現，府考規定每年学額文八名、武八名、苗学（按指仫佬族等少数民族）二名。仫佬族已不断有一些人通过詩文詞賦考取举人和秀才^①。由此看来，自明代以后，仫佬族社会已进入了比較发展的封建社会历史阶段。

封建社会的經濟基础是地主阶级通过对土地的占有而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剝削。封建統治者和地主阶级，只知橫征暴斂，榨取民脂民膏，而对社会生产和人民生命毫无理睬，致使水、旱、虫、病等灾害連年发生。以罗城一地而論，文献就有不少記載：

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发生大旱，五谷无收，人多餓死^②。

明成宗景泰元年（1450）发生大飢荒，人多餓死^③。

明英宗天順八年（1464）干旱严重，五谷不收，餓殍載道^④。

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天气反常，日炎如暑，夜寒如多，人多瘟疫死亡^⑤。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发生飢荒，人民生活无着^⑥。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1549）发生大飢荒，民采野物为粮，餓死甚众^⑦。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瘟疫流行，死人极众^⑧。

明神宗万曆元年（1573）羣虎为患，田舍荒蕪^⑨。

明神宗万曆十五年（1587），飢荒虎患相繼^⑩。

万曆四十五、四十六年（1617—1618）大旱，赤地千里，飢民流死，鬻妻妻子者甚众^⑪。

清順治五年（1648）发生瘟疫^⑫。

①《广西通志·柳州府》

①⑩《罗城县志》《天河乡土志》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⑪均見《罗城县志》及罗城县仫佬族社会历史調查材料。